

# 潮水与堤坝：“移民红利”与东北经济发展的历史考察（1860—2000）

李 军 郝子瑾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文章以“移民红利”为核心分析框架，系统考证了1860—2000年间移民规模的变化与东北经济的阶段性兴衰过程，并考察了移民规模与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及转型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突破了将移民简单抽象为同质化劳动力要素的传统视角，转而聚焦移民群体所特有的“低成本高强度劳动力属性”“高储蓄倾向与低生存阈值”及“高地缘网络属性”，系统阐释了这些属性如何具体地驱动了东北的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与产业规模化，从而塑造了其早期的经济繁荣。文章将此过程视为一个完整的历史周期，旨在揭示“移民红利”的内在矛盾：前期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塑造了特定的产业生态与制度惯性；随着后期人口流动放缓与外部环境变革，这套曾经有效的模式难以调整，其积极效应逐渐消退，而负面制约则日益凸显，具体表现为人力资本难以提升、内生投资乏力及阻碍现代市场与制度构建。文章认为，对东北而言，移民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其红利机制本身即蕴含着日后消退与阵痛的根源。

**关键词：**东北经济；移民红利 “闯关东”；路径依赖；转型困境

**中图分类号：**F129；K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6）03-0125-12

## 引 言

近代以来东北地区的开发与变迁，始终与规模浩大的人口迁移浪潮紧密交织。自1860年开禁放垦以来，关内山东、河北等地农民大规模“闯关东”，使东北从人烟稀少的地区迅速转变为农产区。<sup>①</sup>20世纪上半叶，移民潮伴随铁路、矿山和制造业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东北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重心南移、传统重工业面临产能过剩与技术升级压力，东北出现了经济增长放缓、人口外流、资源型城市萎缩等转型困境。<sup>②</sup>移民浪潮的起伏与东北经济的阶段性兴衰呈现出高度的同步性，塑造了该区域从“北大荒”到工业重镇再到面临转型困境的独特发展轨迹。

既有的学术研究为理解东北移民与经济史奠定了坚实基础。现有成果主要沿两条主线展开：一是移民史研究方面，通过对档案、方志的系统梳理，深入揭示了移民流动的宏观图景。例如，路遇、石方等学者较早系统地勾勒了移民的规模、结构与动因，李德滨、石方对黑龙江移民的梳理，范立君对近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的长时段考察，以及李军对20世纪以来“闯关东”移民回流的历史考察

**作者简介：**李军，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史、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郝子瑾（通讯作者），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专业方向：农业经济史。

① 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40页。

② 王智勇《东北人口为何外流：一个工业化城镇化的视角——基于黑龙江省县域面板数据的分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等,均从不同时段与维度详尽考证了自清季开禁放垦以来,移民潮的结构、规模、波动、来源地及背后的推力与拉力等因素,为我们提供了人口流动与人口结构的宏观图景。<sup>①</sup>二是从经济史角度展开的研究。周春英、范立君、谢颜、何一民、余爱青等学者的研究,将移民作为劳动力要素,探究其对东北土地开垦、农业扩张的基础性作用,以及作为人口基础对工矿业、交通网络发展的支撑。<sup>②</sup>这些研究普遍达成一个共识:大规模移民是东北近代化起步和中期繁荣的核心驱动因素之一。

然而,现有分析多关注移民群体的劳动力属性,将其作为同质的生产要素进行分析。在多数讨论中,移民被看作从外部给定、性质均一的劳动力供给变量,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常被简化为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这种视角忽视了移民作为一个现实社会群体所具有的多样特质。例如,他们作为生存型移民,往往表现出较低的生活需求门槛和较高的储蓄意愿,依靠血缘与地缘构建起紧密的社会网络,这种网络又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其生产效率。同时,这些特质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也促使他们形成了以低成本和强劳动投入为特征的供给模式。因此,这些研究缺乏对东北地区前期移民经济与后期经济转型困境关联性的深入探讨。

因此,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移民群体所特有的“低成本高强度”“高储蓄倾向”与“高地缘属性”等具体属性出发,以期更细致地揭示移民成为东北经济发展关键动力的微观机制。同时,试图从更长期的、动态的视角来探究移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仅关注移民在前期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关注在后期路径依赖下,移民经济模式对东北经济转型造成的负面影响。

## 一、移民规模的变化与东北经济的阶段性兴衰

纵观1860年至2000年的东北发展史,移民潮的规模波动与区域经济的兴衰起伏呈现出同步的历史节律。当大规模移民涌入时,东北的土地开垦、资源开发和工业建设便进入加速期,当人口流动放缓或逆转时,经济增长也往往随之乏力或陷入困境。以下将试图通过数据勾勒这一同步演变的宏观图景。

### 1. 移民潮的规模变化与波动特征

清代东北,疆域辽阔,据《满洲考略》载“初土壤甚广,东西相距三千余里,南北三千二百余里,东尽大海,南界朝鲜渤海,西界内外蒙古,北踰外兴安岭,与俄属西伯利亚地犬牙相错。”<sup>③</sup>但在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失去了外东北大片领土,东北实际边界缩小“东控沿海州以出日本海。南拊朝鲜半岛之背以瞰日本。北扼黑龙江以阻俄人东下之路。西控蒙古,跨长城,以

<sup>①</sup> 路遇 《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石方 《中国人口迁移史稿》,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李德滨、石方编 《黑龙江移民概要》,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范立君 《近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860—1931)》,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李军 《20世纪以来“闯关东”移民回流的历史考察》,《中国农史》2015年第2期;张利民 《“闯关东”移民潮简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高乐才 《近代中国东北移民历史成因探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赵英兰 《清代东北人口与群体社会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李亚婧、李楠 《近代东北移民乡村社会家庭人口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1期;褚宏霞 《清代中期东北移民落籍举措探析》,《历史档案》2023年第2期;曲立超、陈小杨 《民初东北移民生存困境与社会应对》,《理论观察》2024年第8期。

<sup>②</sup> 周春英 《试论近代关内移民对东北经济发展的影响》,《济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范立君 《近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860—1931)》,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谢颜 《1912—1931年东北地区移民的影响与启示》,《人口学刊》2022年第4期;何一民、余爱青 《移民、交通与工业:晚清民国东北城市发展的多维度考察》,《贵州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梁磊:《清中叶以降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研究》,《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11期;孙玉龙、范立君 《清雍正朝移民东北及其社会意义》,《兰州学刊》2018年第12期;丁绍通、韩宾娜 《1930年代东北地区人口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地域文化研究》2018年第3期;邢春冰 《劳动力流动与东北三省的经济史》,《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范立君、黄秉红 《清末民初东北三省移民与近代城镇的兴起》,《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牛淑萍 《清代山东移民东北述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吴晓松 《东北移民垦殖与近代城市发展》,《城市规划汇刊》1995年第2期。

<sup>③</sup> 龚柴 《满洲考略》,载王锡祺辑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帙,杭州:杭州古籍书店,1985年影印版,第139页。

制中原。西南据辽东半岛,以控黄渤,隐握东西两洋之关键。”<sup>①</sup>东北区域行政规划亦有变化。1907年以前,东北地区由三大将军管辖,包括盛京将军、吉林将军与黑龙江将军辖区。1907年后,清政府设立行省,东北区域包括奉天省<sup>②</sup>、吉林省与黑龙江省<sup>③</sup>。此后,东北区域下辖的府、县乃至省界在民国、伪满洲国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历了频繁的细分与重组。

本文作为一个长时段研究,研究区域的划定遵循以下核心原则:以近现代东北的核心地理与文化单元,即清末及当代的辽、吉、黑三省为稳定可比的核心研究区。基于此,本研究具体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60—1931年),对应晚清至民国前期。此阶段以清末民初稳定的东三省,即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行政建制为核心研究区。该范围是近代东北移民潮兴起的基础空间,具有政权统一、数据连贯的特点。第二阶段(1932—1945年),即伪满洲国时期。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对东北的行政区划进行了重大改组。考虑到研究疆域的一致性,本文研究区域主要限定在兴安四省及黑河、龙江、三江、滨江、吉林、“间岛”、奉天、锦州共计12省。这与清末划定的东三省边界大致相同,能完整反映此阶段移民政策的实施范围。第三阶段(1946—2000年)<sup>④</sup>,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末。在区域界定上,为确保长时段的可比性并反映完整的区域经济社会联系,本文研究区域以1945年后形成的辽、吉、黑三省为主体基础,同时纳入行政、经济与文化上与东三省高度一体化的内蒙古东部地区,包括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此定义覆盖了从战后重建、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完整历程,使移民趋势的分析在一个相对连续且一致的地理空间内进行。

学界对东北地区移民数量波动已有深入探讨,但受限于史料,现有研究多集中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且移民数据多来源于《满铁调查报告》等日本调查资料,难以形成长时段连续分析。为系统呈现1860—2000年间移民波动的整体图景,本研究首先明确东北地区的地理范围,并综合多种史料,汇集该时段的人口数据,对其中缺失年份采用线性插值法<sup>⑤</sup>予以补充。进而,通过全国历年人口增长率<sup>⑥</sup>,推算东北地区历年人口总量,将其与东北地区历年人口实际人口总量相减,得出历年净迁移人口数量,从而直观反映该地区的迁移动态。

假设初始年份为 $T_0$ 年,后一年为 $T_1$ 年,则历年净移民数量变化计算方式如下:

$$T_1\text{年净移民数量} = T_1\text{年东北实际人口} - \left( \frac{T_1\text{年全国总人口} - T_0\text{年全国总人口}}{T_0\text{年全国总人口}} + 1 \right) \times T_0\text{年东北实际人口}$$

由此,1860—2000年间东北地区历年净移民数量趋势如图1所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东北区域的界定因清代、民国、伪满洲国及新中国等不同时期的行政区划演变而有所调整,并非完全一致的地理范围。然而,各时期研究范围的主体核心区域,即传统的东北地理单元,均保持了连贯性与可比性。因此,该趋势图所呈现的虽非绝对精确的年度数值,但其长期波动与阶段性转折所揭示的总体变化趋势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① 于逢春、厉声主编《东三省纪略》,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8页。

② 1929年改称辽宁省。为统一称呼,后文均称为辽宁省。

③ 民国1914年设立热河省,省会承德。该省有时会被视为东北的一部分,但因其地理上更接近华北,故本文所探讨的东北地区不包括热河省。

④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45年9月公布了《东北九省行政区域方案》,在东北地区设立了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此“九省制”方案存在时间极为短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东北地区的行政区划迅速重组、合并。本研究为保持长时段分析的空间连续性,并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稳定实施且与当代语境最为接近的行政区划框架,故采用“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作为此阶段的基本表述。

⑤ 本研究涉及的部分历史年份移民数据存在缺失。为构建连续的时间序列以进行趋势分析,本研究采用线性插值法对缺失数据进行补充。该方法基于相邻已知数据点,假设其间的变化呈均匀线性趋势,从而估算出缺失年份的数值。具体而言,对于在年份 $t_a$ 和 $t_c$ (其中 $t_a < t_b < t_c$ )有数据 $y_a$ 和 $y_c$ ,而中年年份 $t_b$ 数据缺失的情况,其插值 $y_b$ 的计算公式为: $y_b = y_a + \left[ \frac{(t_b - t_a)}{(t_c - t_a)} \right] * (y_c - y_a)$ 。

⑥ 全国历年人口增长率计算方式为,第二年人口数量减去第一年人口数量与第一年人口数量的比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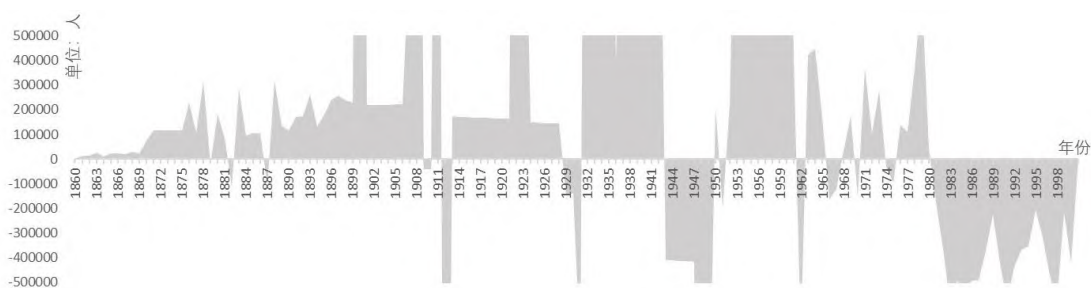


图1 1860—2000 东北地区净移民数量变化趋势<sup>①</sup>

说明：(1) 东北地区人口数量：1860—1911 年来源于赵英兰《清代东北人口与群体社会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年，第 59—60 页；1922、1923、1929 年数据来源于韩茂莉《历史时期东北地区农业开发与人口迁移》，《中国园林》2021 年第 10 期；1932—1942 年数据来源于山中峰央「満州国人口統計の推計」『東京経済大学経済学』Vol. 245, No. 1, 2005；1949—2000 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英文本）》，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年，第 266、300、334 页；1949—2000 年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数据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内蒙古统计年鉴 198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 年，第 14—15 页推算。其余缺乏年份采用线性插值法补充。(2) 全国人口数量：1887、1911 年来源于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10 页；1912、1928、1930、1931、1935、1936、1947 年数据来源于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291 页；1949—2000 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英文本）》，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年，第 6 页；其余缺乏年份采用线性插值法补充。

第一阶段（1860—1931 年）为移民高速增长与持续涌入期。1860 年是一个关键节点，清政府正式在东北局部地区开禁放垦，标志着持续 200 多年的“封禁政策”开始松动。此后，开放区域逐步扩大。1908 年，清政府颁布《沿边招垦章程》<sup>②</sup>，从法律和制度上彻底废除封禁，转而以免税、授地、提供路费与生产资本等系统性优惠政策鼓励移民实边，移民潮因此加速。直至 1910 年前后，东北地区净移民流入量呈现出指数式增长，多个年份超过 50 万人，这得益于政策激励和东北肥沃的土地资源。1910 年至 1920 年间，关内资本的进入、铁路的延伸以及工矿业初步发展，对移民形成了更强的经济拉力。然而，1911 年前后，因辛亥革命的爆发及随后的军阀混战，导致社会动荡、生计困难，净移民增长短暂转为负数，但随后又恢复上升趋势。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移民以增长趋势为主，仅在政治动荡时出现小幅波动。1931 年前后，受九一八事变和日本侵占东北的影响，东北社会秩序崩溃，净移民再次短暂为负。但整体上，1860 年至 1931 年间移民保持了高速涌入的态势。

第二阶段（1932—1945 年），东北处于日伪统治下，移民模式呈现畸形增长。日本侵占东北后，建立伪满洲国，实施殖民政策，一方面强制迁移日本和朝鲜移民以巩固统治，另一方面掠夺资源发展军事工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移民流入。然而，这种增长是扭曲的：移民多由日伪政权组织，服务于战争经济，而非自然的人口流动。1930 年代前半期，九一八事变及伪满洲国建立导致社会动荡，移民一度减少；进入 1930 年代中期后，在强制政策和工矿开发的刺激下，净移民有所回升，例如 1935—1940 年间年均移民流入约 20—30 万人。但 1941 年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北经济负担加重，资源枯竭，加上战乱蔓延，移民吸引力下降，净移民增长放缓并趋于不稳定。<sup>③</sup> 这一时期移民数量虽偶有上升，但整体受政治操控，缺乏可持续性，属于畸形状态。

第三阶段（1946—2000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北移民趋势经历了从恢复到流出的根本转变。

① 因本图并不探讨移民的具体数值，只显示大致的趋势，所以为保证长时段内趋势图的直观性，本图显示的移民人口数量范围峰值为 50 万。

② 魏影《清末民初黑龙江移民社会保障述论》，《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5 期。

③ 山中峰央「満州国人口統計の推計」『東京経済大学経済学』Vol. 245, No. 1, 2005。

1941年至1949年前后，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影响，社会动荡、经济凋敝，东北净移民持续为负数，人口外流以避难和谋生为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经济重建，移民态势逐步扭转。1953年至1959年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东北作为重工业基地快速发展，国家组织大规模建设移民，净移民量激增，形成移民高潮，年均流入超过50万人，峰值年份甚至达80万人以上，这主要得益于政策引导和工业化需求。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东北移民增长回归波动，受自然灾害、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净移民在正负之间徘徊，但整体保持小幅流入。198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推进，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面临转型困难，经济增长放缓，就业机会减少，导致人口持续外流。自此，净移民转为负数，流出量大于流入量，例如1990年代年均净流出约30—50万人，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2000年，反映了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市场化进程中的资源再分配。

## 2. 与移民同步的经济总量变化

由于清代缺乏系统的GDP统计数据，而传统经济以农业为主体，本文选取1860—2000年间东北耕地面积的变化趋势作为考察该地区长期经济总量演变的一个代理指标。本文参照不同文献记录的东北区域耕地数量变化，依据东北地区“1公顷=13.56清亩=15市亩”的计算标准<sup>①</sup>，统一将耕地面积单位换算为市亩进行比较。东北地区耕地面积变化曲线如图2所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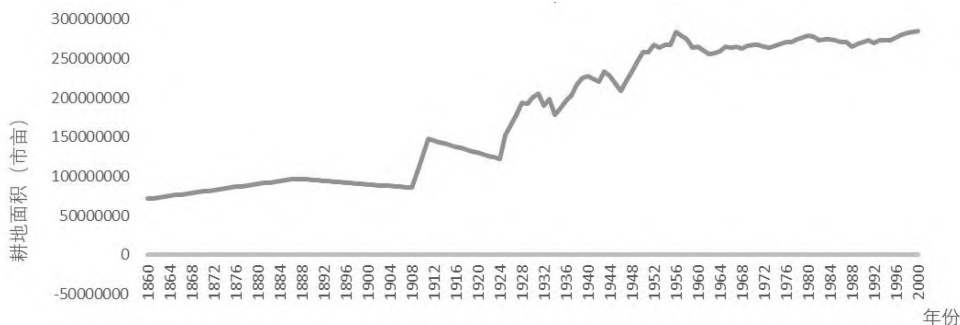


图2 1860—2000年东北地区历年耕地面积变化

说明：1887、1911年耕地面积来源于史志宏《清代农业生产指标的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5期；1908年数据来源于王业键《清代田赋刍论（1750—1911）》，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33页；1924—1944年数据来源于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农产·生产篇）》，北京：京华印书局，1948年，第4—5页；1946年数据来源于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华民国统计年鉴》，中国文化事业公司，1948年，第71页；1949—2000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英文本）》，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第278、312、346页；1949—2000年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数据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内蒙古统计年鉴198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年，第58页推算；其余缺乏年份采用线性插值法补充。

从耕地面积变化曲线可见，东北地区在长达140年间经历了从加速扩张到增速趋缓的过程。这一轨迹与同期移民潮兴衰的总趋势吻合。自1860年开禁放垦至20世纪30年代初，耕地随移民大量涌入而快速拓展，此后直至20世纪末，增速逐步放缓，恰与移民动力减弱、人口转为净流出的阶段性转折相互映照。

摘录现有的宏观经济数据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1949年之后东北地区GDP占全国总量的比重变化呈现清晰的波动形态。在1949年至1980年间，该比重出现一个显著的峰值，反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北作为重工业基地所经历的经济高速发展期。然而，1980年之后，这一比重呈现明显且持续的下降趋势。这一经济占比的转折点在时间上与东北地区净移民数量由长期净流入转为持续净流出的历史拐点基本对应。

<sup>①</sup> 尤文郁主编《黑龙江省志·土地志》卷8，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1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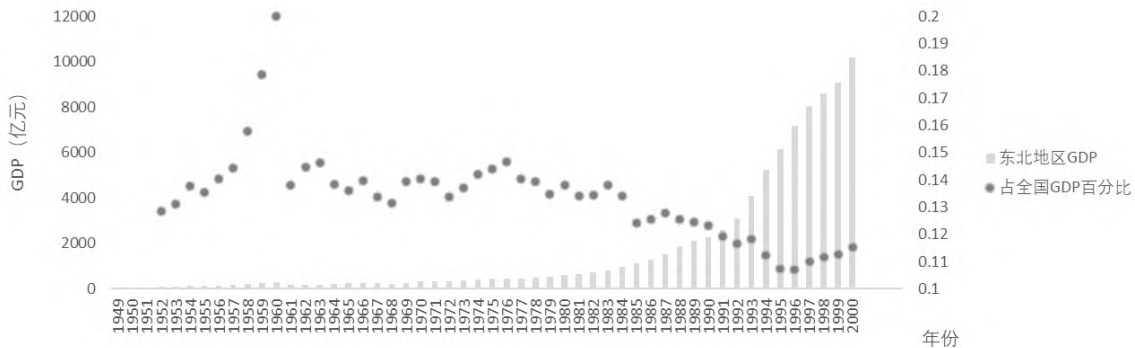


图3 1949—2000年东北地区GDP变化与占全国GDP百分比

说明：东北地区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英文本）》（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第269、303、337页；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数据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内蒙古统计年鉴198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年）第62页进行推算。

如图4所示，移民数量的波动在整体上影响着东北地区经济的演进节奏。尤其是在数据相对完整的1949年以后，这种联动关系更为清晰直观：1949年至1960年前后，伴随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建设性移民涌入，东北GDP占比同步迅猛上升；而在1980年左右，当移民增长出现由正转负的决定性拐点时，东北GDP占全国比重的曲线也同步进入下行通道，两者转折几乎同时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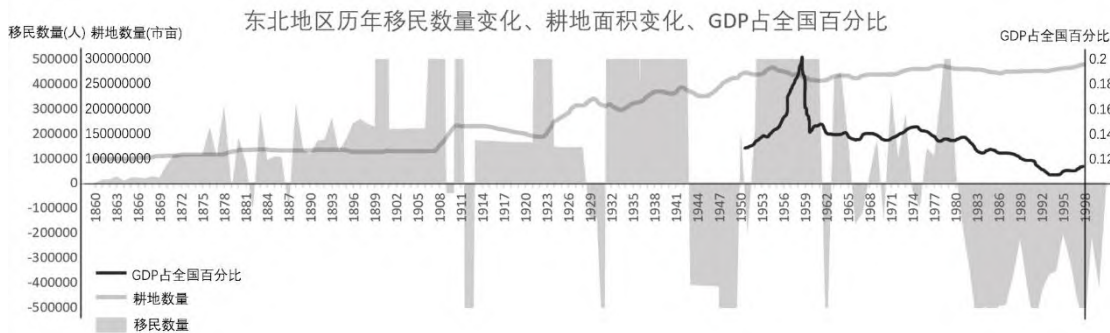


图4 东北地区历年移民数量变化、耕地面积变化、GDP占全国百分比

## 二、东北的繁荣——移民如何推动经济增长

历史数据清晰地表明，移民潮的涨落与东北经济的起伏紧密相连。不过，“移民”作为“人口”的一个下位概念，其性质具有特殊性，不能简单地将其抽象为劳动力要素来分析。要真正理解“移民红利”的驱动机制，需要进一步审视这一特殊群体自身所具有的经济社会属性。与本地自然增长的人口不同，大规模迁入的生存型移民在劳动力供给、资本形成与社会组织层面上，均展现出深刻影响区域发展路径的独特品质。

### 1. 低成本高强度的劳动力属性：推动工业化与资源开发

首先，移民自身是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力，有更高的适应性，愿意从事收益很小的工作，因此大规模开发那些初期回报率不高的荒地和矿山变得有利可图，潜在的自然资源得以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价值。这种特征为东北新兴的工矿企业和扩张中的农业提供了近乎无限的、廉价的劳动力。正如满铁调查部数据显示，绝大多数移民并非为追求财富而迁移，而是为生存所迫而逃亡，甚至连移民旅费都需出卖财产、典当借贷才能筹措。

表1 1930年关内移民旅费来源

旅费来源	户数	百分比
自己所有	225	16.07
出卖财产	659	47.07
典当财产	179	12.79
借贷	170	12.14
亲友赠予	59	4.21
沿路乞讨（无路费）	11	0.79
其他	97	6.93
合计	1400	100.00

资料来源：郝正《东北边疆历史与文化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7页。

东北地区资源丰富，平原广阔。清末，日本人统计东北已开垦平原面积达到13700平方里。<sup>①</sup>而彼时山东等地区“人民甚多。其土瘠，其民不足以自养。加之黄河氾滥，年年被灾，其民之苦于是者，殆不聊生矣，故不得不移住于满洲以图自存也”<sup>②</sup>。1926年南开大学对山东移民1149户家庭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关系”与“天灾人祸”而离乡者占总数的96.3%，其中直接因“生活困难”而迁移的便高达49.5%。<sup>③</sup>因此，土瘠民贫、黄河连年泛滥的推力，与东北地广人稀的拉力相结合，塑造了一个庞大的、赤手空拳的劳动力后备军。他们在家乡已失去或从未拥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唯一的谋生手段就是出卖劳动力。

这种接近彻底无产化的状态，决定了移民对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要求降至生存底线。当中东铁路于1898年开工并在天津、山海关招募筑路工人时，尽管工作条件艰苦，仍因“工资较高”而应募者络绎不绝，三年内即招募约20万人<sup>④</sup>。在矿业与垦荒领域亦是如此，移民往往愿意接受“籍青”<sup>⑤</sup>分成制或极低的初期工资，从事本地居民不愿或无法承受的艰苦劳动。

从经济机理上看，这种大规模、低成本的无产移民涌入东北，导致劳动力供给急剧增加，工资水平大幅下降。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用工成本极低且劳动力供给充足。低工资一方面使企业能将更多资金用于购置设备和原料，加速资本积累，另一方面，显著提高了资本回报率，刺激了进一步投资。这使得在开发东北丰富的煤炭、森林、土地等资源时，即使前期投资大、回报周期长，也变得有利可图。

其次，移民不仅具有廉价的属性，且人口结构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具备“高强度”的体力特征，从而在质量上完美契合了东北早期开发对劳动力的苛刻要求，亦即在质量上匹配了东北早期工矿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

东北矿产资源丰富，煤、金居多，占比约为矿产资源总量的78.3%<sup>⑥</sup>。早期的核心开发活动，如矿山采掘、森林砍伐、铁路修筑、荒地开垦等，无一不是劳动密集型且环境恶劣、强度极高的重体力工作。本地居民稀少，且往往不愿从事此类艰苦职业。而源源不断涌入的关内青壮年移民“从事开

① 上海作新社编译《白山黑水录》，上海：作新社，1903年，第94页。

② 小越平隆《满洲旅行记》下，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第34页。

③ 马平安《近代东北移民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54页。

④ 常城《东北近现代史纲》，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6页。

⑤ 沈斌华《内蒙古经济发展史札记》，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4页。

⑥ 赵英兰《清代东北人口与群体社会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5页。

拓”，正好填补了这一劳动力特质上的空白，“后移来者日夥，开拓之业日盛”。<sup>①</sup>

从性别结构上看，东北移民潮也以男性为主。由于迁移决策多出于生存压力，且东北初期开发环境艰苦，移民往往选择“移往满洲，向系只身不带眷属”的模式。大量统计数据显示，移民群体中青壮年男性占据绝对多数。例如，1927年，关内流向东北的移民中，男子占84.1%，女子占15.9%。1929年，内地居民经过大连、营口、安东、沈阳四地的移民中，男子占比达82.7%，女子为17.3%。<sup>②</sup>与1927年相比，女性占比有所回升，但男性依旧为绝对主体。

移民人口结构上具有的青壮年男性为主导的属性，带来了多重积极的经济效应。首先，他们提供了高强度的有效劳动，在采矿、垦荒、筑路等行业中显著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其次，这些单身男性劳动力还具备流动性极强的特点，能够跟随工作机会在铁路沿线、矿山和林区之间快速转移，从而优化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

最后，这一群体的生活需求极为简单，其维持生存所需的工资底线被压至最低，从而进一步稳定了整体劳动力成本的低廉水平。这些效应共同强化了移民低成本、高强度的双重特质，有效推动了东北地区工业化与资源的开发。

## 2. 高储蓄者倾向与低生存阈值：驱动资本形成并提升投资回报率

首先，移民普遍怀有明确的财富积累目标，即赚钱回乡置地或在东北安家立业。正如时人所观察的，他们“赤手空拳，迨积数年之积蓄，一变为自立之农家”<sup>③</sup>，其首要目标是通过极端节俭与辛勤劳作，获取足以安身立命的微薄积蓄。这种强烈的未来导向，使他们表现出极高的边际储蓄倾向。他们将劳动所得的微薄工资中的大部分，在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后，尽力节俭下来进行储蓄。例如，在1923年至1930年间，关内移民的定居率在多数年份超过40%，甚至在1927年达到66.1%。那些零散的、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人储蓄，通过钱庄、邮局乃至早期的银行体系汇集起来，转化为一笔可观的信贷资金，为当地的工商业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资本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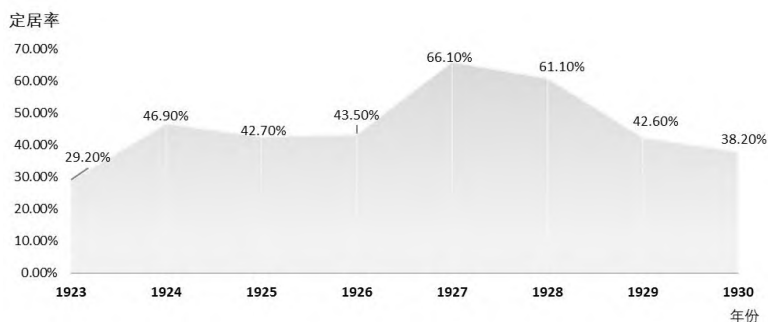


图5 1923—1930年关内移民定居东北的情况

资料来源：马平安《近代东北移民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59页。

这些力图“迨积数年之积蓄，一变为自立之农家”的移民直接拉动了本地商业与初级市场的兴起。正如史料所载，“拓殖东北者，日用所需时感不足”，为满足这些需求，由移民开设的杂货铺、酒肆等应运而生，从“强烈之酒”到“粗劣棉花、靴、帽”，商品逐渐丰富。这些店铺往往还兼营汇兑，发挥着民间金融机构的功能。商业活动从交通便利之地向周边辐射，最终“都市遂随之而兴矣”。<sup>④</sup>就连边陲城市珲春，“城池设立仅六年，而商贾之来此经营者已比户而居，一切日用之物无乎

① 辽宁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整理《辽宁旧方志·奉天通志》卷5，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852页。

② 赵英兰《清代东北人口与群体社会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17页。

③ 王印煊《1911—1937年冀鲁豫农民离村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13页。

④ 池子华《晚清中国政治与社会》，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6—247页。



不具。其初三四店铺，后山东、山西各省之人源源而来，遂成一大市集”<sup>①</sup>。移民的消费维持了基层市场的活力，而他们的储蓄则为市场的扩大和产业的升级提供了潜在的资本动力。

其次，移民的低生存阈值属性提高了企业的资本回报率，从而刺激了投资。移民离乡背井的根本原因是在家乡无法生存，这决定了他们的生存阈值被压至最低。对他们而言，一份能勉强糊口的工作已属改善，因此对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要求极低。这种状态使得无论是中国本地资本还是外国资本，都能以极低的成本雇佣到工人。对于工矿企业和垦殖公司而言，这意味着在项目启动和扩张阶段，最大的一项可变成本，即人工成本，被极大地压缩了。成本的降低直接拉高了资本的预期回报率，使得即便那些投资周期长、风险较高的资源开发项目也变得有利可图，从而刺激了各方资本持续投入东北的矿业、林业与农业。

### 3. 较高的地缘属性：推动生产效率提升与产业规模化

首先，东北移民群体具有鲜明的地缘属性，这种地缘属性促成了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与飞跃。移民以“直隶、山东两省为多”<sup>②</sup>，两省是当时中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最为成熟的地区。最初的东北本土农民在农耕中大多采用“火田法”<sup>③</sup>等粗放耕作方法，直到汉族移民到来后，才得以改变。至18世纪初期，东北地区农民已普遍采用中原地区汉民族的“休耕、轮作”法。<sup>④</sup>农具方面亦然，土著居民工具单一，而汉族移民从关内带入了铁犁、锄、镰等生产工具。这使得东北黑土地的潜力被极大释放，单位面积产量和农业总产出得到显著提升，不仅满足了快速增长人口的粮食需求，更为经济作物种植和农业商品化奠定了基础，将东北从边陲荒地逐步转变为近代中国重要的粮仓。

其次，紧密的同乡网络也为工矿业技能扩散与商业组织的构建提供了高效的渠道。在工商业方面，移民群体快速形成了一批具备基本技能的产业工人，降低了企业的培训成本，加速了工业化进程。这种依赖地缘关系的社会组织模式在移民过程中极为普遍。民国时期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关内移民是以2至10人的小团体形式结伴前往东北的。这种结伙而行的迁移模式，既是出于路途互助的安全需要，也天然形成了以地缘、亲缘为核心的最初级生产协作单元。

表2 民国时期东北团体移民的组数人数比率

组员数	单独	2—10人	11—20人	21—40人	41人以上	合计
组数(个)	602	1790	136	39	4	2571
比率(%)	23.4	69.6	5.3	1.5	0.2	100

资料来源：马平安《近代东北移民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57-58页。

由此，当移民抵达后，他们很自然地聚族而居，相互扶持，共同受雇或垦荒，将这种基于信任的非正式组织延伸为生产活动中的有效合作形式。例如，据黑龙江嫩江县志记载“直民流域，光绪三十年间，直省人为商于嫩，现在有携眷而欲寄籍者。”<sup>⑤</sup>存在直隶移民吸引本族或亲人形成地缘性行业组织的现象。

清朝后期，手工业工场主及伙计、雇工大多来自内地的汉人移民。光绪年间，黑龙江地区的山西商人已经“本巨利厚，店中执事不杂一外籍人，分店亦遍及各城”<sup>⑥</sup>。表3记录了喀城各类店铺中不同层级人员的籍贯分布，来自山西、直隶、山东等关内省份的移民，几乎垄断了理事与伙计等中高层职位，而底层雇工则混合了关内新移民与本地劳力。1931年《东北年鉴》亦有载“来东北之经营商

① 李澍田主编《琿春史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764页。

② 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3页。

③ 徐杰舜《中国汉族通史》卷2，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2页。

④ 张伯英《黑龙江志稿》卷16，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98页。

⑤ 凤凰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黑龙江府县志辑》卷10，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232页。

⑥ 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3页。

业者，多系内地各省之客籍商人。以直鲁晋三省之人多为。”<sup>①</sup>由此形成了所谓的直隶帮、山西帮、山东帮等。移民群体不仅提供了劳动力基础，也是商业资本与管理技能的携带者。特定地域群体通过紧密的乡谊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将分散的移民个体整合为驱动东北商业与手工业走向规模化、组织化的核心力量。

表3 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造出送喀城店铺及伙计、雇工花名清册

籍贯	太原	永平	顺天	永吉	伯都那	济南府	河间	莱州	总计
理事	26	20	12	4	4	4	1	3	74
伙计	19	15	9	12	9	6	1	2	73
雇工	46	22	10	61	50	4	1	11	205

资料来源：赵英兰《清代东北人口与群体社会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49页。

### 三、红利褪去后的结构性阵痛与困境溯源

劳动力流失导致经济下滑，这是老工业地区发展的普遍困境。然而，由于移民群体的特殊属性，东北地区1980年代的经济衰落也不能仅用劳动力减少来笼统概括。移民具有的“无根”属性曾经是开发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但当经济转向时，这些特质就转变成社会结构的脆弱点。路径依赖让这种基于移民的特殊属性形成的传统经济模式无法轻易转变，从而加重并延长了东北地区在红利褪去后面临的产业升级与技能沉淀困难。

#### 1. 从劳动力优势到人力资本困境：低端发展路径锁定

20世纪末，东北经济增长放缓，就业机会减少，大量青壮年移民及其后代选择“反向闯关东”，向沿海发达地区流动。进入21世纪，东北地区人口减少幅度扩大，2010—2020年东北三省从南到北人口减少幅度依次递增，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人口分别减少116万、339万和648万。<sup>②</sup>此前，早期移民所具备的“低成本高强度”劳动力属性，曾是东北工业化的关键动力。但这一特质在初期释放巨大产能的同时，无形中将经济发展轨迹锁定在了对廉价体力劳动的深度依赖之上，长期抑制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提升。

首先，从劳动力供给结构来看，早期移民多从事采矿、垦荒、基建等体力密集型行业，这种就业结构长期抑制了技能提升与人力资本积累。移民的“高强度”属性完美契合了早期开发对体力的苛刻要求，但也意味着大部分工作岗位是重复性、低技能含量的。正如人力资本理论奠基人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所指出的，经济发展取决于人的质量，而非仅仅取决于人的数量。然而，在东北的早期工业化进程中，企业面对近乎无限的廉价劳动力供给，缺乏动力去投资员工的技能培训与教育。对移民劳动者自身而言，在生存压力下，其人力资本投资策略也倾向于短期化，即优先获取即时现金收入，而非进行周期长、回报不确定的正式技能学习或教育。这种供需两侧的共同作用，导致劳动力市场长期维持在一个低技能均衡状态。当资源型产业如煤炭、森林开采等，因资源枯竭或市场变化而衰退，或当重化工业面临技术升级和自动化改造时，原有劳动力队伍中沉淀的、高度产业专用性的体力技能便迅速贬值。他们难以适应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或现代服务业所要求的认知技能、专业技能和综合素养。此外，东北地区迁出人口中，男性占比高于女性。<sup>③</sup>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从而产生了大规模的结构性的失业。

① 东北文化社年鉴编印处编纂《东北年鉴》，沈阳：东北文化社年鉴编印处，1931年，第1014页。

② 蔡翼飞《东北地区人口收缩的经济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5年第4期。

③ 王维华《东北地区人口迁移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及实证研究》，辽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51页。

表4 1990—2020年东北地区就业率变化情况（单位：%）

年份	全国	东北地区
1990	72.34	68.05
2000	62.04	51.24
2010	63.35	55.66
2020	56.12	46.20

资料来源：蔡翼飞《东北地区人口收缩的经济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5年第4期。

其次，从产业发展惯性来看，长期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增长模式，使得企业和政策更倾向于规模扩张而非技术投入。这种模式在微观上塑造了企业的成本结构和竞争策略，在宏观上则固化了区域的产业结构。如果一个经济体长期依赖低技能劳动力和成熟技术进行生产，那么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就低，进而抑制了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而这又反过来导致高技能劳动力供给不足，迫使企业继续采用低技能技术，形成恶性循环。在东北，得益于移民带来的持续低成本劳动力供给，工业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偏向通过增加劳动力投入、扩大生产规模来实现增长，而非通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使在国家政策层面多次倡导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升级的背景下，由于当地缺乏足够规模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工程师和管理人才储备，企业进行根本性技术创新或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的成本极高、风险巨大。

## 2. 从高储蓄倾向到资本形成缺陷：削弱内生增长动力

移民高储蓄、低消费的财务行为，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功不可没。大量微薄收入通过节俭汇聚，成为早期开发的重要资金源泉。然而，从长期动态视角审视，有效的资本形成不仅依赖于储蓄规模，更关键地取决于储蓄向生产性投资转化的效率与方向，以及金融体系能否将资本有效配置到回报率高、驱动长期增长的部门。

首先，受前期政策性或经济性因素影响，东北地区移民储蓄具有很强的“回流”属性。大多数移民对东北地区发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部分移民仍将积蓄视为在关内原籍建房、购地或养老的保障，而非在东北本地进行长期生产性投资的资本。这一倾向使得通过钱庄、邮局等渠道汇集的大量社会储蓄，无法充分地沉淀为支撑本地产业深化发展的长期资本。企业扩大再生产和产业升级所需的持续性投资因而面临源头活水不足的困境。因此，尽管移民个体节俭、勤劳，汇聚了可观的储蓄总量，但从长期和区域产业资本深化的角度看，这些储蓄未能充分、稳定地转化为驱动本地工业技术深入发展的长期性、耐心资本。当大规模国家投资介入后，这种民间储蓄的分散性与短期性更被掩盖，但其未能形成深厚的当地产业金融文化这一缺陷，则在国家投资退潮后才显现出来。

其次，移民的谋生特性和资本家的运营模式导致投资取向的短期化。移民自身流动性强，追求快速变现；早期实业资本则高度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倾向于短、平、快的回报。两者结合，使得社会资本更愿意投向煤炭开采、大豆加工等能快速获利的资源性行业和初级加工业，而非周期长、风险高的技术研发和设备升级。这种普遍的短期逐利心态，与产业结构升级所必需的“长期投资”理念无法匹配。由此，近代东北地区的资本未能有效推动经济向技术密集型转型，也削弱了其长期的内生增长动力与抗风险能力。改革开放后，东北经济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的分量持续下降，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东北振兴战略以来，国务院分别于2003年、2009年和2014年三次出台实施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相关指导性意见，这些政策成为东北经济发展的重要节点。<sup>①</sup>然而，即便有外部的政策推动和资金扶持，产业转型的实质步伐依然缓慢。根据历年统计年鉴数据，东北地区2000—2015年技术合同成交项目数显著下滑。

<sup>①</sup> 杨东亮、赵振全《东北经济失速的投资性根源》，《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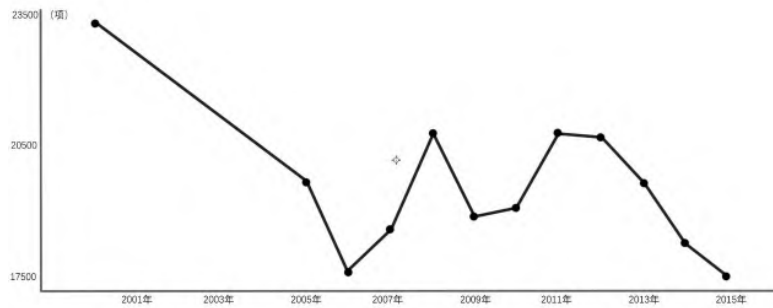


图6 2000—2015年流向东北地区技术合同成交项目数

说明: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https://ceidata.cei.cn/>。

### 3. 从地缘网络效率到社会资本桎梏: 部分阻碍现代市场与制度构建

在移民初期, 基于籍贯、亲缘形成的地缘网络在信息传递、就业互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降低了交易成本。然而, 随着时间推移, 这种非正式网络容易逐渐固化为封闭的利益团体, 进而形成行业壁垒和裙带关系, 给人才与资本的自由流动带来了阻碍。

首先, 依赖地缘、亲缘的特殊主义信任与合作模式随着市场规则与法律制度的完善, 逐渐被淘汰, 但这种关系型的路径依赖仍产生持续影响。在东北移民初期, 法律与正式制度供给严重不足, 依靠老乡或同族关系建立的信任, 是确保交易安全、降低合作成本的最有效方式。而当市场经济改革全面推开, 社会要求建立以产权清晰、契约精神、法律平等保护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制度时, 这种人情网络模式难以及时适应, 导致市场规则落地滞后。因此, 外来投资者或新型市场主体若无法快速嵌入本地既有的关系网络, 就可能面临隐形的交易壁垒与不公平竞争<sup>①</sup>, 进而抑制了更广泛的创业活力与资源配置效率。

其次, 紧密且相对封闭的地缘网络易形成利益固化的圈层结构与人才、观念的近亲繁殖,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知识多样性、人才流动性及颠覆性创新的产生。<sup>②</sup> 社会网络的强关系虽然有利于隐性知识的传递和既有技能的熟练化, 但根据创新理论, 突破性创新往往来源于异质性信息的交流与碰撞, 而这更需要弱关系发挥桥梁作用。东北地区基于地缘网络的封闭社会结构, 对接纳新主体、孕育新业态形成了阻碍。

## 结 语

东北近代的繁荣显著得益于“移民红利”, 该红利所带来的低成本劳动、高额储蓄与紧密地缘网络驱动了快速工业化, 但同时也固化了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 埋下了转型困境的隐患。当人口流动逆转、外部环境变化, 原有模式的弊端便凸显出来, 引发增长乏力与人口外流的困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已到了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sup>③</sup>, 进入新时代以来, 中国推进东北全面振兴战略, 正是要超越传统路径, 通过创新驱动与改革开放, 激活内生动力, 推动老工业基地迈向高质量发展。

责任编辑: 刘 莉

① 寒迪、陈华 《从制度变迁看东北振兴的路径依赖与路径选择》, 《企业经济》2005年第3期。

② 徐娅楠 《关系建构: 闯关东移民村落秩序生成的进路与逻辑》,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23年, 第199-200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编 《新时代 新发展 新成就——从党的十八大到二十大》第1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年, 第448页。